

《边境风云》和《万箭穿心》，它们都没有出现在本届金马奖入围名单中……

金马50:幸与不幸的辩证法

木卫二(影评人,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初审评委)

相比内地的金鸡百花奖及香港电影金像奖,金马奖的一大特色就是三地电影共同进行较量角逐,评出最佳。放眼华语地区的电影奖项,只有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覆盖了差不多的疆域版图,但在2007年,金马奖进一步开放了报名范围,只要符合有中文对白、华语电影人参与等具体申报条件,都可以获得入围的资格身份。于是,来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电影也出现在金马奖的入围名单当中,大华语地区电影奖项的概念得以形成。回顾香港电影的极盛时期,它所影响的外部市场恰好正是以上这些地区。

这些年,香港电影的产量维持在五十几部,与黄金时代不可同日而语,躯壳孱弱。而台湾经历了新世纪初的低谷,终于在近些年复兴,年产量达到五六十部。一趟金马奖初审下来,最新的台湾电影是看全了,香港电影的好戏也基本没错过,就连新马电影都看上了一二十部。相较之下,内地电影的报名数量还不够多,整体水准也较为欠缺。一些现象级票房电影外强中干,直接被刷。当然,内地电影产量也实在吓人,2012年更是高达745部,当中多数,观众在电影院看不到。至于在影院看到的,90%以上也可以打入烂片行列。所以,面对如此荒谬的现状,无论充当一名评委还是一个观众,很难说清楚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,抑或是“幸运的不幸”。

金马奖要走华山论剑的路线,不免要云集三地好电影,邀请重量级宾客。结果提名出炉后,有朋友开始疑问:摘得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影片的《边境风云》和好评众多的《万箭穿心》,它们都没有出现。对于这一状况,个人也颇感困惑跟遗憾。这些中小成本电影,票房并不算好,它们本就应该获得更多关注,也亟须金马奖这样的平台来充当跳板,让更多人知道,甚至摘取奖项,就像《到阜阳六百里》和《钢的琴》。并非说除金马以外,它们就没有地方可去了。但不可否认,金马大量发掘了类似的电影,并把它们推举到公众的视野当中——而且往往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。

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客观原因,金马奖报名截止时间是在8月,经历初审、复审以及终审决选,到颁奖典礼已经是11月底。如此说来,在8月到11月上映的片子就面临一个两难窘境,到底是提前送报参加今年评选,或者是留等上映放至明年。一般说来,若要赶上报名,一部电影的制作压力会较大,尤其是那些依赖后期的电影。倘若呈上一个未完成版本,音效和特效都没有完成,绝对影响观感。更何况,有些电影的定剪也是在多方催促下仓促完成,为了赶上定好的档期已是不易,若要提供最终版本,实在有些为难。因此,对一部电影来说,这种抢占先机显然增加了淘汰的风险,对评审来说则是困难考验,毕竟眼前片子缺了什么,真的只能靠脑补。对主办方来说,如果不是赶逢电影大年,他们也会有意识地调剂一下,避免尴尬和不利局面。但往往经过一年,当初的新片已变成旧片,无人过问。尤其是内地电影一月一重天的情况下,金马不是邀请制也不是自动入围制度,不少电影可能就误了日期,坏了大事。

对《边境风云》和《万箭穿心》来说,错失金马可能意味着它们会在日常的新闻播报里消失,不再被集中提起,这是旧片的命运。而对《狂舞派》和《僵尸》等片来说,金马可能只是一个开始,明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才是它们的主舞台,这是新片的冲动。至于年初上映的《一代宗师》,无论在金马还是在金像,都显得像一部旧片,其实还不到一年。不少香港影评人感慨说,如果不是档期一再调整,它本该参加今年的金像奖。

事实上,在一名评委看来,电影没有新片或旧片之分,可放置在电影评奖的环境里头,它们就有了微妙的差别。《寒战》拿过4月份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,那么对于金马奖,它显然会是一部旧片。无论评委出于怎样的考虑,它和梁家辉拿过影帝都是一个既定事实,存在于脑海当中。那么,除非《寒战》是十年一遇的猛片,梁家辉有一览众山小的表演发挥,否则,按照个人猜测,他们在金马恐怕会被“区别对待”。当然,这不过是我的凭空猜想,因为单看今年的最佳男主角提名,确实高手过招,胜负难分。

在华语电影制作往内地靠拢和聚集的今天,很多时候,金马奖被视为锦上添花的奖项,但这些年势头良好。而对金马奖的批评,两头不是。以去年为例,本土有质疑,认为过于倾斜;内地也有剧烈的反对声音,认为有失偏颇。反过来看,即便时间尚未证明结果是幸运或是不幸,那倒也说明了金马的某种勇气。

“背着棺材工作”的大陆电视人!

黄晓雅(记者)

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二季《中国好声音》、《中国梦想秀》录制背后的辛酸……

大陆综艺节目进入“大片”时代,让曾一路领跑的台湾综艺艳羡不已。第二季《中国好声音》落幕时,台湾不少谈话类节目都在热火朝天地探讨近来大陆综艺制作之天价、大牌……综艺大咖们聊到这些总是难掩兴奋之情,恨不得立时三刻飞到大陆投身节目组出金掘金。但抛开这些不说,我对比在两岸各大人气综艺节目蹲守探班的经历,深觉大陆制作团队的苦逼程度何止是对岸的两倍。

以第二季《中国好声音》为例,每期90分钟的节目,背后起码是12小时的艰苦录制,这些苦有时甚至藏在观众怎么也注意不到的小细节里。比如每集片头,四大导师会对着镜头说一段很拽的“宣言”,在火药味中拉开舞台的序幕。这些一闪而过的镜头,拍摄于今夏上海40多摄氏度的高温天里,在闷热的室内,两台巨大的八头灯打在导师身上,还有两台灯照面光,因为收音的关系,不能开空调。有一次轮到汪峰录片头,拍到一半,他便忍不住求饶:“你们看,我今天穿的衣服很厚……”节目组还是不肯放人。直到一个多小时后,汪峰离开时,大家几乎能听到他湿透的衣服贴着身体“啪嗒啪嗒”的声音在场内回响,周围的工作人员更是陪着汗成了雨人。

还有导师考核阶段,节目组进行的是丧心病狂整整两个通宵总计超过24小时的录制,媒体评审团跟着受罪,导师和学员们也苦熬着。比如两天的拉练录制前,那英已经高烧多日,连续在医院吊了5天的盐水。第一晚阿妹和汪峰场录制结束后,那英凌晨还要赶往医院继续输液,直到上午10点才得以回到酒店。而几个小时后,她又在节目组的夺命连环催中,踩着高跟鞋赶到现场,参加第二晚12个小时的马拉松录制。这场考核直到第三天凌晨6点才落下帷幕,而导师们离场后,收拾现场和会议讨论的工作还在等着节目组。

再来说说最近收视夺冠的《中国梦想秀》,也是以熬人而闻名,一组“追梦人”在节目中十几分钟的镜头,在现场要录制2个小时,每期六组追梦人就是直逼12个小时的超长加班。再加上周立波这位酷爱现场

发挥的“梦想大使”,节目编导和工作人员在私底下着急跳脚摔本子也是常有的事儿。

还有一向以“背着棺材工作”著称的湖南卫视团队,新近推出的《爸爸去哪儿》,“零差评”的背后,也是百人工作团队在8月酷热的偏僻乡村日夜蹲守换来的。5位星爸星娃住破屋吃农家饭,工作人员更是没好吃没好睡。小宝贝们在魂斗罗的背景乐中一路狂奔完成任务,摄像师们更是肩扛摄影机在乡间小路上追得哼哧哼哧,现场每位工作人员的背上都是被汗水画下的地图。

对比大陆,台湾的综艺节目早已缩水到几乎只剩“棚内制作”的地步。在《康熙来了》,一周只有一天的录影工作日,在这一天里制作单位会从中午开始录到晚上,完成一周5期节目的拍摄工作,除了小S、蔡康永和陈汉典,其他艺人都是潮水般来去,录完自己的节目就可离开。其他大陆观众较为熟悉的《大学生了没》《女人我最大》等都是类似的制作方式和周期。所以除了雄厚的赞助、引进的模式等,大陆电视人在幕后的拼搏和付出,也为大陆综艺的崛起推波助澜。

梅艳芳遗物拍卖会:中国式“坏妈妈”

黄佟佟(专栏作家)

她们是受害者,然后成为害人者,背负几千年以来中国原生家庭最黑暗的轮回。

一代天后梅艳芳去世十年了,依然风波不断。10月12日,一场梅艳芳遗物拍卖会将在港举行,此事各方立场不一,有人觉得散去总比发霉好,有人出钱出力买回遗物不忍其四散,而有人呢,就在大吵大闹——这大吵大闹的人毫无悬念,是梅艳芳的亲妈和亲哥。过去的十来年里,梅妈和梅哥因为梅艳芳没有把全部遗产留给自己而一直在打官司,直打到自己破产生病也在所不惜,生命力之强悍可见一斑。这次遗物拍卖更让她大发烂渣,有人问她每个月可以从“梅艳芳遗产基金”里领12万元为何仍“不够用”,梅妈中气十足地在记者招待会宣告:“养儿育女,我花她的钱是应该的。”

因为养育了孩子,就觉得孩子一辈子欠自己,他(她)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,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中国式思维。资深心理学家武志红曾说过一个例子,“我们和西方的文化味儿始终不一样,你看古希腊悲剧《俄狄浦斯王》最终的结局是,俄狄浦斯王杀了自己的父亲,虽然最后承担了罪责,把自己的双眼弄瞎。而

中国文化中最早期的圣人是舜,他是任父亲、母亲和弟弟怎么百般地折磨,都用一种逆来顺受的方式去对待。”是的,哪怕是历史上最叛逆的孩子哪吒,在反抗之前也要先剔骨还父割肉还母,也就是说你得先死一回才能有反抗的可能。这是中国文化对普通民众最深层的人伦暗示,“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”。就在100年以前,父母打死孩子都是不被追究的。90岁的梅妈正是这种思维下浸淫出来的母亲,“你连身体都是我的,何况你的钱呢”。

中国酱缸文化盛产一种“坏妈妈”。这种妈妈认定孩子是她私有财产,“有些人说家里人对他不好,你们管我怎么对她,就算真的不好,跟外人也无关。”直到女儿去世十年后,梅妈也理直气壮;而更具中国特色的是她还有强烈到不能再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:她强令自己的两个女儿小小年纪就辍学,浓妆艳抹上台卖唱以供哥哥读书全家生活,待女儿走红之后更成为她的摇钱树,买房、给“家用”,数目足够三个小康家庭开支,原因是还有两个儿子的开销包括在内;

更有甚者,儿子做生意亏上千万,理所应当妹妹要去还……梅妈像极了张爱玲《金锁记》里怪戾的曹七巧,看上去实在不像坏人,在丈夫退位的家庭里含辛茹苦养大子女,一生勤劳克己甚至可以称得上为儿女操碎了心——但她们那极度的占有欲和强烈的性别不平等意识,就像几千年来加具在女性身上的一具黄金枷,女人们用那沉重的枷角“劈杀了几个人,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。”——梅妈的两个女儿是早早就患癌过世,梅艳芳生前激烈到连母亲的面都不愿意见,最后宁愿把两套房子留给一直照顾她的造型师,母女关系疏远到连路人也不如,儿子50岁了失业嗜赌,毫无责任感,谈到妹妹的遗产“立刻情绪激动到大喊大叫”(香港媒体语)。

无论是曹七巧也好,梅妈也好,中国式“坏妈妈”最让人悲伤的地方是她从来不认自己是坏人。她们是酱缸文化的受害者,然后成为害人者,她们伤害了自己女儿,也毁掉了自己儿子,背负几千年以来中国原生家庭最黑暗的轮回,可叹、可悲,可恨又格外可怜。

点赞,为龚琳娜的冒犯实验

韩松落(专栏作家)

在这个时代做艺术家,不但要和自己的创造力挑战,还得和保守之力、和视听惯性挑战。

龚琳娜在“全能星战”节目中,以一首《但愿人长久》震撼全场,却以最低分垫底。在后台痛哭一场后,她表示,自己仍要探索要创新。评论人黄鑫亮认为,她的这种态度,像是“一个女科学家的伟大理想”。

龚琳娜和她的丈夫老锣,的确像一对科学家。从《忐忑》《法海你不懂爱》《金箍棒》到现在的《但愿人长久》,每一次亮相,都像是一次科学实验,不但探查音乐创新的效果,也在探查人们的接受度。他们还会收集人们的意见,认真进行反馈。《但愿人长久》唱罢,票数最低,老锣很生气,龚琳娜曾大哭,但气过哭过之后,他们显然仔细看了网络评论。龚琳娜发布微博,对人们提出的层次递进大突兀、句末尾音过重等问题做了表态,表示会在下一次演唱的时候进行改进。这分明都是科研工作者的态度。

瑞士作家雷托·U·施奈德写过一本《疯狂实验史》,描述了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实验。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,那许许多多实验,的确是癫狂的甚至惨烈的。但我们今天的一切成就,其实就建立在这些疯狂实验的基础上,从吃螃蟹到载人航天飞机,莫不如此。

流行音乐也需要这种实验。从时代曲的“小妹妹腔”,到邓丽君用精致的方式来梳理歌曲,到王菲从“极地双子星”和“小红莓”那里借鉴来的气声和假声,每一次进展,背后都得有强大的支撑,需要发声技术、扩声技术、录音技术的联动,更需要人们刷新自己的接受度。一次进展,在声乐上的进步长度,或许只有一毫米,后面需要的各种支撑的进展,恐怕得有十公里。今天的大部分女声,如果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恐怕会成为《怎样鉴别黄色歌曲》里的反面例证。黄绮珊那样的声音,如果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,鉴于舞台扩声设备有限,很难有用武之地,群众恐怕也不领情。咱们容得下那些实验,并因为那些实验受益,就该容

得下龚琳娜和老锣的实验。

何况,龚琳娜和老锣,有过那么美的实验结果。那首《相思染》,悲郁难书,让人每次听来,都有泪欲奔涌的冲动,但歌里的悲,却又是那么正大的一种悲,像颜色格外纯正的蓝。《你在哪里》,貌似词不达意,凌乱急促,却将追寻之哀痛、遍寻不得时的心乱如麻表达得扣人心弦。那可也是“民族唱法”,却和那些穿着大裙子的“民族唱法”天差地别。

可惜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时代,唱片覆灭,新媒体接棒不力,做音乐的,听音乐的,都在静观其变中变得保守,在这个时代做艺术家,而且是带着科研取向的艺术家,不但要和自己的创造力挑战,还得和那种保守之力、和视听惯性挑战。

挑战是冒犯,挑战也难免失手,但这跌跌撞撞的冒犯实验之中,能有《相思染》、《静夜思》、《但愿人长久》,这冒犯就算是值得的。当龚琳娜在《但愿人长久》中以向苍天呼吁的姿态,唱出那段“啊——”,我们被那些陈腐稳妥的歌倦扰过的心脏皮肤,麻了一下,跃动一下,这冒犯就是值得的。

